

# “东方经济”与中国乡村工业化的社会学机制

——重访史国衡的个旧矿城研究

闻 翔

**摘 要** 本文对“魁阁”社会学家史国衡 1940 年代在美访学期间的一部未刊稿《个旧矿城》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史国衡的个旧研究呈现了一个将产业、民情与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进路，通过对个旧锡业兴衰的个案分析，揭示了传统“东方经济”模式的独特特征以及决定中国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同时也以个旧经验对现代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当时美国社会科学主流范式提出了反思。《个旧矿城》与另一部更为人所熟知的著作《昆厂劳工》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关于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姊妹篇，“工业化的社会基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线索。对史国衡个旧矿城研究的“再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工业研究传统，同时也提示我们，当下的乡村工业化乃至乡村振兴仍然需要重视产业的社会基础，处理好经济转型与社会重组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史国衡 个旧矿城 乡村工业化 东方经济

作者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4-0142-10

## 一、引子：一部尘封的“未刊稿”

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前辈中，史国衡是 1930—1940 年代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他 1939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后加入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是魁阁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昆厂劳工》是中国社会学最早的工厂民族志研究之一，也是魁阁时代工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曾于 1944 年经费孝通与许琅光翻译成英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sup>①</sup>，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学界对史国衡学术生涯的讨论即主要集中于此书。但是，史国衡其实还有另外一本重要的“佚著”尚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他 1940 年代后期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用英文写就的《一个中国矿城：一项关于工业与社会的研究》（*A Mine Town in China: A Study of Industry and Society*）。这部书稿本是史国衡为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研究报告，除其中一小部分内容曾在著名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发

<sup>①</sup> Shih, Kuo-heng, *China Enter the Machine Ag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siao-tung Fei and Francis L. K. Hs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表之外，<sup>①</sup>并未正式出版。史国衡1948年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史国衡改行从事图书馆工作。1995年史国衡去世后书稿仍保存在家属手中，且由其女婿姜忠良先生翻译成中文（姜译本将书名译成《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下文提到该书时即依此译名）。2012年史家将书稿连同译稿一同捐献给清华大学图书馆。迄今为止，这部书稿仍然静静地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甚少为学界同仁所留意。<sup>②</sup>

在笔者看来，这部未刊稿构成了史国衡短暂学术生涯的另一个代表作，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关于产业与劳工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与更为人熟知的《昆厂劳工》相比，这两部书一为工厂民族志，一为矿区民族志，都是将费孝通在魁阁所主张的“社区研究”进路落实到工业研究的产物。史国衡自己也曾将这两本书视为其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姊妹篇。因此，如果要完整理解史国衡甚或“魁阁”的学术遗产，这部未刊稿是必须纳入视野的。同时，这部书稿所呈现的鲜明的社会系统论视角与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实际上受到了史国衡在哈佛期间所从学或合作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列维（Marion J. Levy）、梅岳（George Mayor）等当时美国第一流的社会学家、管理学家的直接影响或启发，其写作过程本身亦受惠于与这些哈佛同仁的交流与讨论；但另一方面，史国衡又时而在书中流露出他基于个旧的乡村工业化经验对美国主流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的反思乃至批评，其关于个旧的“东方经济”模式的分析则更是在与马克思·韦伯所奠定的比较经济史传统进行对话，因而亦构成了1940年代中西社会学交流与互动的一个特殊个案，在学术史上自有其讨论的价值。本文即旨在以对这一学术史个案的梳理为中心，重新发掘与认识史国衡先生的社会学遗产，在此基础上，省思其对于当下的乡村工业化研究的启发意义。

## 二、《个旧矿城》：缘起与经过

个旧在当时是云南乃至全中国最重要的锡矿工业城市，被称为“锡都”。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提到对个旧锡业的相关研究，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其实是另一位清华社会学家苏汝江于1942年出版的《云南个旧锡业调查》。<sup>③</sup>事实上，苏汝江在个旧做调查时的助手即为史国衡。史国衡当时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四年级的学生，1938年8月，他随本系教员苏汝江一起来到个旧，主要负责矿工个人生活史以及当地民谣的收集和整理。<sup>④</sup>1939年，他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毕业之后，他先留在清华国情普查所短暂工作过一阵，后很快转入“魁阁”。1943年，史国衡受国民政府社会部的资助再次来到个旧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两次调查共历时3个半月，史国衡的足迹因此遍布个旧城区以及山里的矿区。也正是因为这第二次的调查，使得史国衡得以观察到个旧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过程，从而让他后来写作《个旧矿城》一书时具备了前述苏汝江的调查报告所没有的变迁视野。

1938年第一次调查时，个旧锡业正处在其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产锡国由于签订了“国际锡控制计划”而限制产量，中国因为在这个计划之外反而得益，二战的爆发又使得锡价高涨。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个旧的锡出口在全世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个旧是滇边除昆明外最繁荣的城市，锡炉林立，商贾云集。但到了1943年第二次调查时，个旧锡业则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方数十里之厂房多成废墟，数千户之城垣顿成冷市”。<sup>⑤</sup>这种强烈的今昔对比使得史国衡开始自然而然地思考一个问题：决定地方工业升沉荣枯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成为他后来写作《个旧矿城》一书最直接的动力。

1945年10月，经吴文藻推荐，在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外交官费正清的帮助下，史

① Shih, Kuo-Heng,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in-Mining in Yunnan."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1, 1947, pp. 53-61.

② 杨清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曾简要提及此书，这是唯一的例外。但她的文章并非针对该书的专门研究。参见杨清媚：《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魁阁时期“燕京学派”的工业研究》，《学海》2020年第4期。本文对史国衡这部未刊稿的关注即受惠于杨清媚的提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王佳钰慷慨分享了她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拍摄的书稿照片。在此致谢。

③ 苏汝江编著：《云南个旧锡业调查》，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2年。

④ 关于苏汝江的个旧调查以及史国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参见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⑤ 史国衡：《论个旧锡业》，《经济建设季刊》1944年第2卷第3期，第120页。

国衡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资助来到美国，与哈佛商学院教授、“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者梅岳进行人际关系方面的合作研究，同时也在帕森斯主持的哈佛社会关系系学习。在哈佛期间，史国衡对两次个旧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由此完成“个旧矿城”的英文书稿。

### 三、个旧：一种东方经济模式及其担纲阶层

《个旧矿城》一书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体轮廓”介绍了个旧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矿区的政治权力结构，同时重点考察了矿区的工业组织者的社会来源、职业生涯与身份认同。第二部分“组织和活动”则详细讨论了矿区的工业组织、生产过程和矿工的招募、劳动状况、工作条件以及抗争行动。第三部分“不确定和调整”则分析了决定当地锡业兴衰成败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以及矿山经营者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心理调适来应对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最后的“结论”部分则从社会与工业的互动视角总结了该研究的学术意义与政策意义。总体而言，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分别触及到（锡矿）产业、（社会）民情与（劳工）治理三个层面，三者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对于个旧这样一个特殊的工矿城镇的系统分析。就产业而言，史国衡对个旧锡业的总体状况、演变历程、组织形式与产权结构等做了细致讨论。就民情而言，史国衡则主要聚焦于锡矿经理与矿工这两大社会群体，对两者各自的社会来源、生计与心态等做了细致描摹，同时也分析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社会观念与地方权力格局。就治理而言，史国衡则具体讨论了在个旧特殊的经济格局与社会脉络下，如何在劳工与产业政策制定的意义上实现对劳工政治与工业秩序的双重治理。

就问题意识而言，《个旧矿城》一书主要是回答一个萦绕在作者心头的疑问：个旧矿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开采历史，与世界市场紧密接触也已超过半个世纪，但为什么至今仍然维系着原来那一套落后的生产技术、组织方式和混乱的产权结构，无法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与机械化生产？换句话说，个旧为何始终陷入一种停滞的原始工业化状态，而无法向前“进步”？

在史国衡看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无法把个旧放在一个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所描述连续谱中来定位。在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将朝着一个同质性的方向和模式运动，国家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处在这个线性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而已。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即当时在哈佛如日中天的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及其弟子列维等人。史国衡当时身处哈佛，上过帕森斯的研讨课，同时也与正在做关于“中国亲属结构和工业发展”博士论文的列维时相过从，显然也受到了这一理论风潮的影响，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个旧的经济落后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与现代世界相比是处在不同的阶段”。<sup>①</sup>换句话说，在史国衡看来，像中国这具有独特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的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并不是简单地遵循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线性进化论，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史国衡将个旧的工业化困境视为一种现代化理论所无法概括的传统“东方经济”的典型模式。他总结了这种模式的四个具体特征：第一，资金的抽离和转移。在个旧，锡业上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被转移到其他领域。锡矿经营者赚钱之后首要的考虑是在老家买一块田地，其次则是去昆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买房子或店铺。史国衡指出，这主要是出于分散资金风险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获得最大化利润。因为，“资本的构成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sup>②</sup>第二，使用劳力优先于使用机器。史国衡指出，机械化不仅意味着引进机器，还意味着整个企业生产与经营的重组，需要在生产计划、管理控制与技术培训等方面做出调整。而这与锡矿经理的保守性格并不相符，而且使用机器需要一大笔的集中投入，这也破坏了他们分散资金风险的原则。此外，这些经营者大都是从旧式生产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使用机械，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将在新体系中变得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劳动力比机器更具有弹性。<sup>③</sup>第三，高度分散与层层分割的产权结构。在个旧 1303 个矿井中，有 1133 个属于短期租借运营，这里的产权结构是相当分散的，且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相

①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3 页。

②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56 页。

③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56—57 页。

分离，这使得当地几乎无法建立大规模的工业运营。第四，生产效率和成本上的劣势。在史国衡调查的年代，当地已经有政府控制的国营锡矿公司开始使用新式设备和采矿方法，且显示出其在生产效率和成本上的巨大优势。但即便如此，那些私营的锡矿老板仍然不为所动，坚持奉行传统的一套生产模式。

在史国衡看来，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东方经济”与西方工业化模式完全不同的特征。“东方经济”的提法意味着史国衡在这里具备了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经济史的比较视野。韦伯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西方，且仅仅在西方，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化资本主义？而中国则是韦伯视野中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韦伯对中国的宗教、法律、城市经济以及家产官僚制的讨论都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他者的内在逻辑。<sup>①</sup>史国衡在序言中则明确指出，一些经济历史学家在做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而他希望通过个旧研究“在东方经济的组成轮廓上投下一丝光亮”。<sup>②</sup>在这里，他实则是在与韦伯所奠定的学术脉络对话。在《个旧矿城》一书中，史国衡即援引了韦伯的《经济通史》一书。《经济通史》英译本1927年出版，是韦伯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著作，因此，史国衡在讨论韦伯时首先参考该书是十分自然的。《经济通史》主要聚焦于以资本核算和官僚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历史演进，从制度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史进行了整体分析。在《经济通史》中，韦伯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矿业。韦伯回顾了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自中世纪以来矿业法的发展和采掘工业的历史变迁，指出，一方面矿业法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将采矿权以及围绕采掘经营事业的各类行动者的权利关系明确界定，另一方面由于采矿业对资本的要求越来越大，导致整个工业组织的形态逐渐演进到一个相对理性化的阶段，其特征包括自由矿工及其小规模经营单位的式微、奠定在“工业合理的技术和经济的管理的基础上”的大规模经营结构的产生，以及矿产品贸易的发展和矿产批发商的出现。<sup>③</sup>

史国衡对《经济通史》的援引即主要围绕韦伯关于矿业史的讨论展开。史国衡指出，韦伯在《经济通史》中揭示了欧洲的矿业法早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之前就已存在，它明确规定了地主和矿工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之对比，史国衡则强调，在个旧，财产权和租借权从未得到具备普遍效力的法律的明确界定，与法律相比，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加重要且更加不确定。由此，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做到理性化的，而是以社会习惯和宗法制规范为旨归的。换句话说，史国衡所描述的个旧的“东方经济”，实则是一种在韦伯的定义上更加具有传统主义取向的，无法彻底理性化的形态。

在《经济通史》的最后一章，韦伯亦点出了他在其新教伦理研究中讨论的命题，即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发生学问题。韦伯指出，与其他文明囿于传统主义相比，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所塑造的天职观和禁欲伦理在将企业主逐利的经济动力合理化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且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性质的理性化。<sup>④</sup>韦伯将具备禁欲性格的早期清教徒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担纲者，认为正是在这一群体追求一种理性化的经营活动乃至“生活之道”的过程中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sup>⑤</sup>而史国衡在《个旧矿城》中亦给予他笔下的“东方经济”的担纲阶层，即私营锡矿的经理们以浓墨重彩的分析。史国衡批评以往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讨论“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资本、机器、技术人员上，而很少关注企业家的社会选择”。<sup>⑥</sup>这一思路显然受到韦伯的影响。他首先以四位在个旧锡业有一定地位的代表性商人为例，对其人生史与经营史做了一番描述。这些锡矿经理们主要出身于个旧周边的农民、小店员或无地游民阶层，因而无法“自动地理解现代知识和技术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企业”。同时，“他们仍然保持了一种在乡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和交往方式”。因此，当他们从锡矿上积累了财富之后，他们首先做的是按照传统的价值观念买田置地，而不是像韦伯笔下的新教徒那样将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也总是积极寻找政治势力的庇护来保障其产业的安全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但这往往造成了与地方政府的复杂关联，这种政治纽带对企业

① 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2页。

③ 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广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15—119页。

④ 马克思·韦伯：《经济通史》，第221—231页。

⑤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⑥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15页。

经营带来复杂影响。同时，他们虽然身处锡业，却大多希望其下一代子女能远离锡矿，成为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而不是回到矿区继承其产业。

史国衡指出，上述特质也造成了个旧的经理阶层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虽然个旧的锡业完全依靠国外市场的出口，但这些传统的中国生产者“对外国的贸易完全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做出预测以便指导他们的生产”。“他们总是被别的集团玩弄于手掌之上。开头，是沿海的买办垄断着个旧锡的贸易，后来，是当地的军阀控制着他们的外汇，而现在是中央政府代理（他们是被长江下游金融集团所掌握）将所有的出口控制着。<sup>①</sup>因此，当地的生产者在了解、控制和改变产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主动权。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来适应世界市场与产业形势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呢？史国衡分析道，首先，他们依靠当地的传说与信仰，祭拜各种矿王神，将其生意的成败归结于神明；其次，他们在制定企业政策时采取短期和保守的方式，缺乏长远规划与考虑，“他们分散他们的资本，宁愿使用劳力而不是机器，宁愿选择短期、零散的租约而不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合同”。在史国衡看来，“他们有点像用老式武器进行一场新式战争”，<sup>②</sup>但这恰恰却是传统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典型模式。

#### 四、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

史国衡期待这一研究不仅仅是关于个旧的个案考察，更试图超越此个案，对一个更加重要的总体性问题予以讨论和回应，这就是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困境与前途问题。“最近二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时地卷入一个问题的辩论：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工业化？”<sup>③</sup>在史国衡看来，中国工业化的障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但在这所有因素之中，他尤其强调一点，即工业化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他指出，“在大多数对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考虑中，都有一种倾向，即从资本积累、技术人员培训和工人招聘的角度来考虑，而忽视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中国典型工业发展的一般社会环境，也忽视了战后中国新工业必须在其中找到其基础”。<sup>④</sup>

工业化的社会基础意味着，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社会观念相应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的落后即是由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没有发生改变。史国衡在这里呈现出一个颇具帕森斯意味的社会系统论思考。史国衡在该书致谢中非常明确地表示，指导个旧矿城这一研究工作的主要思想是从帕森斯那里借用来的。帕森斯非常强调在现代社会分化而成的诸领域，只有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调适和共生，方能实现系统整合。循着帕森斯的思路，史国衡指出，以往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恰恰忽略了“社会结构、社会技能和人民的见解同等地构筑了引入技术和工业类型及规模的限度”，<sup>⑤</sup>换句话说，在史国衡那里，决定乡村工业化成败的社会学机制即“社会、知识和工业”诸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sup>⑥</sup>

在对工业化的社会基础的讨论中，史国衡重点从“国家与族群”以及“知识与经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就“国家与族群”的层面来说，史国衡认为没有普适的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障碍之一。史国衡援引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指出由罗马法所奠定的合法性观念对于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而在中国，法律不重要，重要的是宗法体系，人们生活在各个宗法集团所塑造的“族群”之中。史国衡强调，现代工业化的基础是普适性法律体系，而不是具有特殊主义倾向的宗法集团，“中国老式的社会模式是永远不能有效地、平滑地与现代化相叠加的”。<sup>⑦</sup>

①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63—64 页。

②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63 页。

③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64 页。

④ Shih, Kuo-Heng,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in-Mining in Yunnan."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1, 1947, p. 53.

⑤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1 页。

⑥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69 页。

⑦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3 页。

史国衡指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宗法体系尚可以维系社会秩序，但是当进入到一个“大的、复杂的政治和工业环境中”，<sup>①</sup>这种宗法体系往往与地方权力政治结合起来，造成对工业发展不利的影响。个旧就是一个极端的个案。史国衡初到个旧调查时，即发现矿区几乎人人带着武器，城中不时响起枪声，所有大型矿场都建造成围墙高大的军事堡垒式样，房舍上有射击枪眼，门口有武装人员守卫，甚至史国衡自己也在房东的建议下雇佣了6名士兵作为保镖。史国衡指出，这种人人戒备的社会氛围其实是当地高度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外部表现。在后来的调查中，史国衡逐渐发现，当地的矿场大多属于某某“上校”“司令”或政府高官。“没有武力、政治力量或一定社会权贵人物的保护，想要经营一个锡矿企业，特别是一个境况好的锡矿企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sup>②</sup>换句话说，当地的锡矿业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军阀和政府官员等强力集团及其裙带关系所把持，矿井的所有权大多握在这些人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这一局面在抗战以后又由于中央政府的介入更加复杂化。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锡的出口进行管制，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即当地人所谓的“下江人”）来到个旧，参与到对锡矿利益的争夺。在当地人看来，“他们那些在中央政府有权有势的亲戚将他们以管制贸易的名义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养活他们”。<sup>③</sup>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实际经营的锡矿经理，其租赁合同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保护，其锡矿的出产也常常被侵夺，因而其企业经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从个旧所呈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我们知道：甚至财产和合同都不能被法律很好地保护。经理们看不清他们自己的未来，也不能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不能不担心他们的企业前途的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在下一年中或在其后几个月中什么事情会在他们的矿山中发生。”<sup>④</sup>正是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锡矿经理们在制定企业政策时采取短期乃至短视的方式，且一旦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就不再将重心放在企业上，也不愿进行技术升级与投入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转而谋求社会地位的上升，以便在地方权力网络中获得庇护。

就“知识与经济”的层面来说，史国衡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技术改进，而技术改进则依靠于关于现实世界的系统知识。在传统中国，儒学作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从未追求物质生产的系统知识或关于物质生产的有效方法”，且内在地具有“一种厌恶任何社会改变的倾向和看不起任何技术利益”。<sup>⑤</sup>此外，儒家思想也不鼓励创新，“任何创造性的想法和对世界的系统观察都被认为是无价值的”。结果传统知识分子远离实际知识，且和生产者发生分离。在个旧，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与生产者的分离，造成个旧的锡出口业务被把持在外来的买办代理人手里，“对于保守的知识分子来说，买办是一些偏离了传统模式的人；对于当地生产者来说，他们是奸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和生产者倾向于以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待买办而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功能”。<sup>⑥</sup>在这里，史国衡其实已经触及到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分析，他指出，“中国的上层阶级倾向于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中，而且新的上层阶级也多是这些从这些地方中产生出”，“上层阶级逐渐地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关连”，例如大学生对农村的事情一窍不通。而农民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底层，虽然有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力量，但他们需要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是从城市较高阶级中招募来的。他们本身就是处在中国社会关连之外”。<sup>⑦</sup>在史国衡看来，个旧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就必须重建知识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现代技术精英对于工业建设的参与。<sup>⑧</sup>

由此，史国衡对于工业化的社会基础的分析实际上触及到权力与文化两个维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军阀所构成的复杂政治结构对矿产利益的垄断与争夺所造就的以强力为基础的地方产业秩

①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14页。

②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11页。

③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13页。

④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30页。

⑤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67—68页。

⑥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64页。

⑦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6—7页。

⑧ 这与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费孝通始终关心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新型的士绅阶级去介入乡村、重建乡村的可能性。参见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序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念所造就的知识阶层与现代工业的隔膜。而且权力与文化这两个维度是相互嵌套的，史国衡所重点考察的企业家阶层（锡矿经理）正是在地方权力结构与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采取了传统主义的经营取向，而无法进入更加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性格的“理性化”经营。换句话说，权力与文化共同塑造了个旧锡业畸形发展与长期内卷的社会基础。

正是出于对工业化的社会基础的关注，史国衡在本书结论部分讨论个旧研究对于制定工业和劳工政策的启发时，亦强调从社会系统的视角来思考政策的适用性及其社会影响。就工业政策而言，中国工业化到底应该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当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史国衡认为应该选择后者。这当然是与他在个旧所目睹的地方豪强、权力政治乃至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对于当地锡业秩序的干预和破坏性影响有直接关系。在史国衡看来，“政治干预或缺乏社会安全是对个旧锡工业最大的威胁。”<sup>①</sup>但另一方面，我们从史国衡的选择中也仍然可以看到帕森斯社会系统论的影响。众所周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内部的功能分化，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彼此分离，遵循各自独立的运作逻辑。<sup>②</sup>按照这一思路，史国衡认为，虽然私营企业存在各种问题，但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应该走私有化道路。因为在中国彻底走向政治民主化之前，工业国有化意味着将政治领域的专制和腐败逻辑带入经济领域，这只会加强经济的无效率与混乱。与此相反，“自由的私人工业政策将帮助领导经济结构走向正确的道路”，<sup>③</sup>政府要做的则是在鼓励自由企业的同时将其影响局限在公共服务范围之内。同时，史国衡也强调了这种自由经济的担纲者，不应该是像个旧锡矿矿主那样局限于旧式经济伦理的人，而应当是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新工业家”群体：“现代工业世界是由新工业家组成的。一个现代中国不能由中世纪的烦恼者，也不能由保守的官员、新老学究式人物组成，而应由一个集合了现代世界的社会和技术技能的独立的工业集团组成”<sup>④</sup>。

就劳工政策而言，史国衡认为，政府奉行的劳工政策过于理想化，且主要移植西方的标准，而没有考虑中国自身的社会和经济情势以及既有的历史传统，因而其实得不到严肃的执行，由此造成政策与工业发展现状的脱节，结果使得“一些地点靠近大城市的国有工厂变成了劳工福利事业的展示窗口，而在一些分散在各地的落后企业中，仍然实行他们的封建式运营”。<sup>⑤</sup>以个旧为例，在战争期间，社会福利部门曾有一个改善个旧矿工劳动条件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因为忽视了个旧的实际情况而无法落实。此外，史国衡还批评中国劳工政策的制定过于看重有形的物质方面，却“忽视了他们（指劳工——引者注）的社会背景、信仰、喜好，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方面”<sup>⑥</sup>。

## 五、从昆明到个旧：史国衡的内在学术理路

史国衡曾夫子自道，他的《昆厂劳工》与《个旧矿城》“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形体”。两者一是对大都会当中的现代机器工业的研究，一是对乡村当中的原始重工业的研究，两者共同构成了史国衡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整体研究。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从昆明来到个旧矿区时，人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中国恰像一条患了中风的巨龙，它的头进入了机器时代而它的爪子和身体仍然卷曲在中世纪时代”<sup>⑦</sup>。如果说对昆明的现代化兵工厂（即“昆厂”）的研究描绘了巨龙的头部，那么，对个旧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形态的传统锡矿业的研究，则将目光向下，聚焦于巨龙“仍然卷曲在中世纪时代”的爪子和身体。同时，正是昆厂研究所揭示的中国城市工厂工业的种种乱象与困局方才凸显出个旧研究的意义所在：在史国衡看来，中国工业化的出路仍然在于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型与重建的可能性，乡村工业化的成败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成败，至少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基础。“头”与“身体”的对比，其更深层的隐喻其实在这里。

①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55 页。

② 帕森斯、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

③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69 页。

④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71 页。

⑤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74 页。

⑥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73 页。

⑦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4 页。

从昆明到个旧的转向也呈现了史国衡内在学术理路的演进历程。首先，从《昆厂劳工》到《个旧矿城》，意味着从单个工厂的个案分析拓展到对整个地方产业以及围绕着产业所组织起来的地方社会的社区研究。而且，除了从工厂到社区的延伸之外，两者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昆厂劳工》主要聚焦于工人群体内部的组织、分化与矛盾，而《个旧矿城》不仅对矿工的生活与劳动过程有所讨论，更将视野拉开，将矿区内部各个类型的行动者，包括地方上的政治强人、矿产的所有者、经营者、赞助者、簿记员和监督员、工头和矿工全部纳入视野之中，且将分析重心放置于对锡矿经理阶层的讨论上。

其次，两者的问题意识亦有所区别。这两个文本分别处理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问题：《昆厂劳工》是从工人角度提问，为什么现代化的国营工厂中的工人不努力劳动，反而消极怠工？而《个旧矿城》则是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提问，为什么个旧锡业近两百年来始终维持较为原始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实现产业升级？但是两者的解释思路则都是从工业的社会基础这一视角出发的。《昆厂劳工》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工厂内部的社会解组现象，来自乡村的工人脱离了原来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纽带，无法在工厂中形成一种契合与团结关系，因而其身心得不到安顿。<sup>①</sup>而《个旧矿城》则从中观与宏观层面指出锡矿经理们所嵌入的传统社会权力结构及其价值规范如何阻碍了个旧锡业的现代转型。

但是，恰恰在这里，这两项研究之间呈现出某种有意思的张力。昆厂研究关心的是工厂中的非正式关系，但个旧研究则好像走到了另外一面，强调正式组织与制度的重要性。昆厂研究指出的工厂内的社会解组现象意味着企业治理仅仅依靠彻底的科层体制与“技术管理”是行不通的。而《个旧矿城》则强调需要从旧式的社会组织中挣脱出来，依靠普适性的法律制度来促进工业的理性化。前者是一个对制度主义有所保留的思路，后者则是看似彻底的制度主义，因而看起来也特别激进的立场<sup>②</sup>。换句话说，从昆厂研究到个旧研究，史国衡似乎呈现出某种学术上的微妙转向。

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向其实是与史国衡到了哈佛之后对于哈佛人际关系学派之于中国的适用性的反思分不开的。前文已经述及，史国衡到哈佛是在哈佛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者梅岳教授那里从事合作研究，梅岳也曾对《昆厂劳工》对于工厂中的非正式关系的关注表示赞许，认为这恰恰是哈佛人际关系学派的思路。但到了《个旧矿城》一书中，史国衡已经指出，人际关系学派之所以关注工厂中的非正式组织，是有其具体的自二战以来的美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观照的，即对于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可能性的焦虑。因此，这一学派才会特别强调在一个正式的组织内，非正式的组织与人际关系是否还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这是美国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研究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中国工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重点也许恰恰应该翻转过来，因为“如果西方正式组织走得太远，它将可能成为一具没有鲜肉的干骨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只有鲜肉，没有骨架”。<sup>③</sup>正如个旧的个案所呈现的，中国工业化的障碍恰恰在于“传统的非正规组织的过度发展阻碍了沿着现代路线的、有效的工业进展”。因此，史国衡认为就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争取更多的机会去观察一些正式的组织怎样才可以从非正式的组织中出现”。<sup>④</sup>

当然，虽然这两项研究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乃至转向，但史国衡的态度其实要更加复杂，他最终选择的实际上是一条中间道路。他既批评一些中国工业问题的学者“一方面想引入西方的技术和工业效益，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传统样式”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另外一派认为“中国必须完全走或重复走向现代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除非所有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全部根绝了，并且将所有的人民变为互不相关的分离人，否则不可能建立起任何高效的工业”的观点。换句话说，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必然会对工业化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工业化摆脱不了的起点；另一方

① 关于《昆厂劳工》的一个更加细致的讨论，参见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② 杨清媚即认为在燕京学派的工业研究中史国衡的态度是最为激进的。参见杨清媚：《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魁阁时期“燕京学派”的工业研究》，《学海》2020年第4期。

③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66页。

④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66页。

面,他又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又必须消解掉传统中那些阻碍性的因素,现代工业组织需要“从传统的社会形式中成长起来”。在史国衡看来,这意味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工业变迁与社会重组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任何文明的社会动力学与一定的方向相沟通是不困难的,但是,通过沟通中介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如,同时满足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确是非常困难的”。<sup>①</sup>而这种平衡状态如何达成,则恰恰是决定中国工业化成败的关键所在。<sup>②</sup>

## 六、余论

史国衡 1948 年回国后还曾与帕森斯的弟子、后来成为发展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的列维一起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商业阶级的崛起》的小册子。这是他们两人共同参与的一项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研究课题“现代中国商业阶级的发展”的一份前期报告。<sup>③</sup>在这本小册子中,史国衡对中国商业阶级的分析也是以他在个旧的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的。显然,如果历史给他足够的时间,史国衡关于个旧的研究工作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我们知道,1949 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史国衡的学术生涯被迫中断。史国衡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时期的老同学刘绪贻曾专门撰文感慨其未能人尽其才,认为他是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sup>④</sup>史国衡的老师费孝通在晚年也曾表达过对史国衡的工业化研究未能继续下去的遗憾:“本来我刚开了一个门,想从中国最早的工业化,也就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开始研究,我想跟上去,让史国衡继续做下去。但后来他到美国去念书了,回来后,抗战胜利了,他也不继续搞了,再后来他到清华去搞事务工作了。这个研究就没人搞了,就中断了。”<sup>⑤</sup>

本文对于《个旧矿城》的“再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略为弥补费孝通、刘绪贻等人的遗憾。这部未刊稿自写成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但一直尚未进入学界的视野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份被“冻结”的学术遗产。将这份遗产重新“打开”,不仅使我们对史国衡本人的学术理路与学术贡献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魁阁乃至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乡村工业研究传统。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脉络中,以费孝通等人为首的燕京学派始终将乡村工业视为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枢纽性问题。有学者曾颇具洞察力地指出,在燕京学派的视野中,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sup>⑥</sup>这个基本研究思路从费孝通 1930 年代的《江村经济》一书开始奠定,又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代魁阁诸同仁的研究中。史国衡的个旧调查,按照其在书中的自述,其立意即来自当时魁阁的主持人费孝通。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构成了我们理解史国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这对师徒是高度“契合”的。而在魁阁的学术版图中,《个旧矿城》其实与费孝通和张之毅合作的《易村手工业》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后者关注的是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手工业变迁,<sup>⑦</sup>而前者则聚焦于乡村工业的另一种类型,即集中化、大规模的传统重工业。两者共同构成了魁阁对于乡村工业化的社会学考察。而无论是个旧研究,还是易村研究,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业转型与社会重组的辩证关系之上。这样的研究进路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费孝通晚年学术生涯的第二春,他在“行行重行行”的社会调查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思考,无论是关于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的讨论,还是对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种种地方发展模式的总结,其实也都是以工业化的社会基础为前提和出发点的。<sup>⑧</sup>

① 史国衡:《个旧矿城:工业和社会研究》,未刊稿,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第 4 页。

② 换句话说,中国乡土工业化的道路,或许并不是走韦伯笔下彻底“理性化”的、以利益最大化与官僚制支配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途径,而是立足于中国乡土社会自身的社会土壤之上,将地方性资源以及文化与历史传统的诸要素进行现代转化,以一种妥贴的方式整合进企业经营与工业发展之中。

③ Marion J. Levy, Jr. and Shih Kuo-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④ 刘绪贻:《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读书》2009 年第 4 期。

⑤ 费孝通、方李莉:《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民族艺术》2000 年第 2 期。

⑥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 年第 10 期。

⑦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⑧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年。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史的层面上讨论《个旧矿城》的意义，对这份“迟到”的学术遗产的“补课”，其更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这部作品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考察当下的乡村工业化乃至乡村振兴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启发或许就在于，我们需要回到经济转型与社会重组的辩证关系上、落实到“产业的社会基础”这一维度来理解乡村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关节之处。就乡村工业化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自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工业化大多遵循来料加工的形式，有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组织模式之所以直到今天仍在长三角等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其将生产组织嵌套在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之上。<sup>①</sup>另一方面，对于乡镇企业及其兴衰的社会学考察也揭示了乡镇企业的经营如何嵌入地方社会的具体脉络与既有的集体制文化传统之中，同时又是如何受到基层政府行为以及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sup>②</sup>而在最近几年来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践中，当扶贫越来越以“项目化”的形式推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掌握产业项目的主导权时，<sup>③</sup>能否夯实项目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建立产业与地方社会的有机关联，避免产业成为“悬浮性”的产业，更是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sup>④</sup>史国衡曾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个社会并不是一个容器，可以在这一刻被清空，而在下一刻又被新的东西填满：一个社会的特殊社会遗产影响着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进程。”<sup>⑤</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对个旧锡业兴衰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工业研究，而必须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研究，是“一个中国矿城”（A Mine Town in China）的研究。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牧秋 见习编辑：朱颖）

## “Oriental Economy” and the Sociological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 Revisiting Shih Kuo-heng's Research on the Mine Town of Kochiu

WEN X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revisiting of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y “Kuige” (“魁阁”) sociologist Shih Kuo-heng during his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entitled “A Mine Town in China: A Study of Industry and Society”. Shih's work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combines industry, moeurs and governance, revealing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Oriental economy model and the soci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in-mining in Kochiu.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mainstream paradigm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t the time, such a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relations school. Together with Shih's better-known book *China Enter the Machine Age, A Mine Town in China* forms a companion volume to his stud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 which “the social ba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a central thread. The rediscovery of Shih Kuo-heng's work helps us to reconnect with the industrial research tradition of early Chinese sociology, and also suggests that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even rural revitalization today stil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industry and deal with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restructuring.

**Key words:** Shih Kuo-heng, *A Mine Town in China*,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riental economy

① 参见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傅春晖：《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参见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社会》2013年第1-2期。

③ 参见冯猛：《项目化时代农村地方产业的风险分担机制——以特拉河镇大鹅产业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④ 参见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孙兆霞：《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

⑤ Shih, Kuo-Heng,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in-Mining in Yunnan.”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1, 1947, p. 53.